

杭州文史资料

(二十)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

杭州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

1998年12月

杭州文史资料(第 20 辑)
政协杭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

印刷:浙江省农科院科技印刷厂
装订:杭州体东装订厂
开本:850×1168/32
印张:9.75
字数:247 千字
印数:1—2000 册
版次: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

浙内图准字(98)第 193 号

目 录

记抗战时期的“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	冯安琪 (1)
“杭州市职业青年福利会”始末	谈 冲 (16)
在抗战前线采访	何扬鸣 (20)
周恩来同志天目山之行	杨一平 (27)
抗战后一张为台湾人民说话的报纸 ——《中外日报》始末	李士俊 (30)
忆亲密战友于子三	李景先 (44)
解放前浙大学生运动琐忆	毛昭晰 (61)
旧时杭城电影业的兴衰与变迁	毛玲甫 (69)
余森文回忆录	朱馥生 (72)
沈九如同志传略	李蕴玉 沈济莹 (129)
记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陈友琴	陆 逸 (135)
接管和改组杭州市商会前后	曹湘渠 (145)
《当代日报》始末	李士俊 (151)
《杭州日报》创刊的前前后后	李士俊 (191)
解放初期的反银元投机斗争	赵冠义 (231)
浙江干校漫忆	马传贤 (242)
我在和平降临朝鲜时的见闻	赵冠义 (245)
解放初期的“中华全国音协杭州分会”	李益中 (259)

记杭州解放初期的民间音乐艺人	李益中 (264)
“赤脚外交家”的故事	刘子成 (269)
杭州广播电视技术发展二十年	曹 煜 (273)
杭州市新华书店发展记实	王丽君 (287)
畚乡助学记	孙宗让 牟 琴 (296)
后记	王其煌 (300)

记抗战时期的“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

冯安琪

今年是“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简称政工队)成立 60 周年。政工队虽由国民党政府组建,但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掌握和领导的抗日救亡革命团体。她吸引和组织了数千爱国热血青年,奔波斗争于浙江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前线敌后,口诛笔伐,唤起千万人民群众起来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国家危亡。有些人还为此英勇捐躯。政工队的斗争活动是在浙江抗日战争史上不容抹去的一段章节,也是抗战时期浙江独树的青年集体旗帜。

1937 年,“七·七”抗战开始不久,桂系巨头之一的黄绍竑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浙江省主席。这是他第二次主浙。他对第一次任省主席时,被浙江的 C·C 派挤走,记忆犹新。这次来浙前,他在山西看到共产党的军队英勇抗日,八路军还解了他被敌人的包围,救了他的命。周恩来同志对他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在山西太原两次和他交谈。当毛主席知道他主浙的任命后,特发电报给周恩来同志,要他再找黄谈话,希望黄到浙后,能在军事上加强保卫东南,政治上加强抗日民众统一战线,团结各界抗日,大力发动青年参加抗战。黄当即表示愿意刷新浙江政治,掀起抗日高潮。他还向周恩来同志要求派干部帮他开展工作。到浙江后,黄绍竑为顺应潮流,也为巩固他自身势力,确实干了几件深得人心的大事。

首先,他找“浙江潮”杂志主编严北溟,请严起草《浙江战时政治纲领》。严北溟于 1927 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的五月间,愤而辞去高薪职务,加入共产党。后因“马日事变”而失去组织关系。严接受任务后,即与中共浙江省委有关同志商量,很快拟就十条纲

领,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加抗日”,“在农村实施二五减租减息”等进步措施,写进纲领,得到了浙江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拥护。黄绍竑很满意,但在省政府讨论时,遭到 C·C 派方青儒、许绍棣的反对。黄表示“省长可以不干,纲领定要通过”,强行通过后于 1938 年 2 月发布施行。

接着黄绍竑陆续发布有关成立各县政治工作队的 4 个文件:《浙江省战时各县政工队组织通则》、《队员守则》、《实施纲要》、《补充规则》。这些法则发布后,各县纷纷成立政工队。全省共有 75 个县政工队,每个队有六、七十名队员。

(一)有特色的县政工队伍

余姚县政工队成立于 1938 年初,队长由比较开明的县长林泽兼任,副队长是中共党员郭静唐,实际是由郭负责。开始时有 65 名队员,县委派党员进政工队,在队里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后来有半数是中共党员。政工队除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组织各种团队外,还发动城乡青年参加“青年宣传室”(简称“青宣室”),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同时通过“青宣室”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支部。到 1939 年 10 月,已有 28 个“青宣室”,8000 多名成员。政工队还到盐区,领导盐民抵制盐商的剥削。盐区建立 6 个“青宣室”,有 1500 多名青壮年盐民参加。“青宣室”成员在征兵时,踊跃参军,几天里就有 140 人报名,成立余姚“子弟兵”,经训练后,随部队渡江作战。当部队要 2000 套便衣掩护渡江作战时,青宣室发动群众只用了 10 天就超额 1000 套完成任务。余姚政工队通过“青宣室”活动,组织近万名青壮年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这些人后来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游击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义乌县政工队于 1938 年 2 月成立,队长由县长吴山民兼,副队长吴璋是中共党员。一开始县委就把一批党员骨干充实到政工队,分东、南、西、北四个区队,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参加农村减租减息,鼓动农村青年参军,建立“义乌营”,发扬民族英雄戚继光奋勇

抗倭精神,开赴前线杀敌。“义乌营”后来成为中共领导的武装“八大队”的一部分。政工队在城区组织中小学生“晨呼队”,每天清晨到大街小巷高呼抗日口号,大唱抗战歌曲,很受群众欢迎。队长吴山民为加强抗日宣传,拿出一笔钱,给当时在县政府挂“督学”名义,实际干政工队工作的中共党员李益中,要他组建剧团演抗战戏剧。1939年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吴山民被撤掉县长职务,派 C·C 分子许次玄任县长。许一到任,首先向政工队开刀,无理扣押队长龚绍达、副队长王行之、妇女干部吴兰碧等,还逐个审讯队员,强迫 15 名队员脱下制服,开除出队。针对许的倒行逆施,中共义乌县委和金衢特委领导支持政工队,发起声势浩大,波及全省的反许斗争。队员奔赴各县队控诉。抗建剧团演出间隙,政工队员上台愤怒控诉许的迫害,深受群众的同情,最后告到黄绍竑那里,黄怒撤许的县长职务,并予记大过处分。反许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展开有理、有节、有利的斗争,得到全省政工队和社会人士的支持,亦得到中共东南局的表扬。

绍兴专区政工队有 70 多名队员,在中共绍兴县委的推动下,绍兴的抗日空气很浓,办起各种政治军事训练班,专署还组织“青年营”、“妇女营”、“少年营”,还办了“战旗剧团”、《战旗杂志》。

1939 年周恩来来浙视察浙江抗日工作,到绍兴时,对绍兴的抗战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后来政工队和“青年营”渡江到江北,组织群众武装,近两个月就组建了 18 个抗日自卫队、2 个妇女工作队和战地青年服务队等 2000 多人。他们随部队对敌奋勇作战。在海盐县茶山镇战斗中,有 22 位勇士殉难。当时他们是浙江省武装抗日斗争中政工队员牺牲最多的队。

每个县政工队除规定的任务外,根据自身条件,都有一定的特色。如萧山政工队,队员都经过严格训练,人数最多时,有 100 多名队员。建队时的队长黄熏,听说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向我浙南地下游击队方面推荐而来的几位爱国进步县长之一(当时一

般国民党人员都不敢到抗日最前线充任县长)。黄鼐赴任后,在他带来的进步干部陆鲁一、张若达、徐星平等的协助下,举办了两个抗日干部训练班,一个是“政治干部训练班”,一个是“军事干部训练班”。各招收地方青年男女 100 名参加训练。当时国难当头,许多爱国青年都想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报效祖国,现在一旦有机会实现愿望,都纷纷报名参加集训。“军事干部训练班”结业后,成立了“萧山县军事工作队”(简称“军工队”)。不久,萧山建立了“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政治干部训练班”结业后,适逢浙江省政府规定全省各县都要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于是,由此组成“萧山县政治工作队”,队长由瓜沥区区长董啸候兼任,唐戌中任干事长,董队长据闻曾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政工队本部设在瓜沥区署内。下设 4 个区队,一、二、三区队为一般宣传队,四区队为演剧队,队长姓孔,能画漫画、排戏、演戏。一区队驻城区,队长王文彦;二区队驻戴村,队长刘茂文;三区队驻瓜沥,队长沈迪康。主要工作为宣传抗日。队员分赴城镇街头、乡村、农庄,刷大幅墙头标语,散发文学、漫画宣传品,教唱抗日歌曲等。宣传内容主要根据“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队员的抗日热情都很高涨。

萧山县在抗战前夕,已没有党组织存在,抗战开始时,成立了以杨克全(现名杨源时)为书记的萧山县委,全县才开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较多的是萧山县政工队。

萧山政工队,是全省各县中较早成立的一个政工队,成立于 1938 年 3 月间。队员最多时共有 110 名,最少时八、九十人,男女各占半数,大多在 18-20 岁左右,只有个别人是 30 岁左右。政工队员生活艰苦,规定每人发单衣、棉衣各一套,月支生活费 10 元(包括伙食费在内)。最初伙食费约五、六元,所余还可零用,后来物价上涨,生活就更艰苦了,有时只能自磨麦粉充饥。政工队每半年到一年举行一次队员大会总结工作,并重新选举干部。每天或数天必进行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学习会。生活上,穿草鞋、跑

山路、睡地铺、吃粗茶淡饭，从来没人叫苦。这种作风也改造了个别原在国民党军政工作过的队员，通过熏陶锻炼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和态度，后来成为真正的革命者。革命作风和队员的爱国热情，也深刻地影响了萧山国民党官吏，如县府秘书兼政工队队长高克振，明知队里有共产党在领导，可他态度较好，处处表示同情。在萧山政工队员中，为抗战先后献出宝贵生命的有陈天柱等5人。建队后即任干事长，后任副队长、队长的唐戌中是个文化人，萧山政工队发行《杭建小报》、《政工小报》、《大家看》等油印报，质量很高，唐在1938年到1941年离开，后来他和冯安琪同在“浙西民族文化馆”工作（冯是浙江省政工第一队的），每每谈起政工队这段经历，他都眉飞色舞，虽十分艰苦，但追忆所及都是令人为之振奋不已的。

（二）省政工队的建立

在各界高涨的抗日热情推动下，黄绍竑喊出了“冲过钱塘江，收复失地”的口号。他看到浙东几个县政工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显著成绩，同时认为浙西对日寇和汪伪的斗争日益复杂艰巨，有必要组建省政工队。于是在1938年9月，在永康方岩举办各县政工人员集训班。参加的是各县政工队骨干3至5人，共300多人。训练项目有军事训练的打靶、行军、游击战术、战地救护等。政治训练有战时政治工作、日语喊话等。时间一个月。结束时黄绍竑亲自动员学员参加省政工队，到浙西前线担任“政治进攻”的使命。在黄的号召下，有181人报名，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三个队，称为一、二、三队，全称为“浙江省政府直属政治工作队”，简称“省政工队”。大队长方元民（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解放前夕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为烈士），大队副郑邦琨，干事莫仲乔（曾是共产党员，当时已沦为叛徒）。大队部驻在浙西天目山，大队部设政治、宣传、总务三个组，还辖有“天目周刊社”“天目通讯社”、“天目书店”、“文化教育室”等。第一队队长为丁麓孙（曾于抗战初去陕北安吴堡青干

班学习政治理论和游击战术)。一队成立时没有党员,到长兴后,由新四军服务团派单洁到浙西,由浙西特委派她到一队,先后发展孙宝琦等8名党员。二队队长为姚旦(大学生,原在银行工作,放弃高薪待遇参加抗战,“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二队建队时就有7名党员。在潜建立党支部后,支书虞路文(即王子达),发展姚旦入党。三队队长是徐萍洲(曾入党,后脱党)。

1939年4月,省政工第二大队成立,队员有185人。大队长欧亚伦,大队副辜雪。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队长洪流(中共党员),二中队队长灵诚,三中队队长江山。第二大队部分队员是浙东各县政工队的中共党员,他们的驻地是临安、富阳等地。

省政工第三大队于1939年下半年成立,原是绍兴三区政工队。三区专员贺扬灵调任浙西行署主任,三区政工队随同调到浙西。三大队队长胡云翼。绍兴的“战旗剧团”原是专区政工队的一个区队,到天目山后改为“民族剧团”,属浙西行署领导,团长仍是墨易,但增加了两名中共党员。副团长陈才庸(1942年被行署调查室杀害,为烈士),音乐指导员和生活指导员李益中(被调查室逮捕后,送上饶集中营关押,1945年重庆谈判后释放),当时李以浙西干训团音乐教官为掩护,兼任剧团工作。民族剧团专演抗战戏,如《魔窟》、《雾重庆》、《大地黄金》等,也演“五四”以来的进步戏,如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剧目。剧团以“民族合唱团”名义开音乐会,大唱抗战歌曲。

(三)肩负使命上征途

省政工第一大队所属三个队,1938年底从浙东的永康出发到浙西前线敌后,向敌伪开展“政治进攻”。上级规定的任务是:

1. 加强政府和民间的联系;
2. 增进军队和民众间的合作;
3. 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工作;
4. 陶冶青年抗战干部;

5. 以精神、行动为民众示范。

100 多个 20 来岁的热血青年,怀着对日寇无比仇恨的心情,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以保国土、挽危亡的迫切心情,高唱战歌向浙西前线挺进,希望早日到达目的地,立即投入战斗。一队分配到长兴,兼管安吉、孝丰;二队到吴兴,兼管德清、武康;三队到临安,兼管於潜、昌化。

政工队到达各自的地区,即开始工作。队员深入到家家户户访贫问苦,组织群众出来参加抗战工作,成立歌咏队,教唱抗战歌曲等,原来沉静的平原、山区、城镇活跃起来了,妇女走出家门,识字学文化,都很用心。她们说不识字很痛苦,是个开眼瞎子,你们政工队来了,连我们不识字的事也关心,真感激你们。男壮丁参加军训,老人们听队员讲战斗故事,控诉鬼子暴行。男女老幼都有自己的活动。一队有位说大书的骆子钊,他年纪较大,人们都叫他钊哥。晚上,他到小镇茶馆里说故事,还自己削了双竹板一面说,一面噼噼拍拍敲一阵。一队在长兴泗安扎下队部后,即对青少年开展工作。泗安原是个大镇,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发达,日寇占领城区后,交通受阻,百业凋敝,小学停课。数百小学生不能上学。一队派队员组织小学生参加读书会、歌唱队。有的孩子很有表演才能,给他们组织了一个“小小剧团”。这些孩子对日寇怀有无比仇恨,非常认真地读台词、排练,在三个队员的辛勤培养下,不久就在镇上演出,后来还到各乡镇演。几个月后,“小小剧团”由队员带领冲过钱塘江到浙东各县去巡回演出,把演出所得全部捐给前方战士。《浙江战时文化月刊》当即报导,给予好评。

长兴煤山的煤矿有数千工人,一队派一组队员在煤山做工人工作,这使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C·C 派骨干)感到芒刺在背。于是在 1940 年 3 月,以日寇要来抢占为理由,派军队把煤矿炸掉,使数千工人及其家属失去生计。在煤山的队员在组长何坚白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善后工作,为失去饭碗的矿工排忧解难,具体

有以下几件工作：

①何坚白和在长兴县府工作的地下党员王继武筹备一笔经费，发给各矿工先解决燃眉之急；

②介绍部分矿工到后方和新四军军工厂，不愿离家的，发给农具费，在当地开荒生产自救；

③组织 40 多名矿工子女，摆脱失学和不得温饱的困境，保送他们到浙西儿童教养团，由省政工队的胡志平、冯安琪，县政工队的谢索福（1942 年 6 月在太 漏地区牺牲）3 名共产党员护送。这是非常艰苦的历程。这些孩子最小的仅 5 岁，穷人的孩子，也是爹妈的宝，离开父母，天天啼哭，翻山越岭时，要背他们翻过一山又一山，行车平原时，还要护着他们躲避敌机的炸弹和扫射，好不容易才到达桐庐泗县埠的儿童教养院。那里有明亮的教室，教育给养都较好，这时孩子们才高兴起来。队员们将他们交给一位大革命时参加共产党的教导主任童友三同志，非常放心。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几位当时的孩子（现在已是离退休干部）还和保送他们的胡、冯保持通信或见面联系。

④由于煤矿破坏，医院关门，工人家属无处看病，煤山组的冯安琪是位医生，她送儿童回来见此状况，向队部提出办个诊疗所，村支书记何坚白很赞成，设法筹来一笔钱，到湖州买来药品和器械，由冯和她发展的党员余静文办起了“煤山工人诊疗所”，免费为工人家属治病。

⑤由队员严月鹿负责办了“妇女工业社”，做布条鞋，解决部分矿工家属生活。她们白天做工，晚上认字、读书。还设立托儿所，有病免费治疗。

（四）宣传队和播种队

1939 年 2 月，中共浙西特委成立，订立的任务之一是：“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组织”。队里党员把它作为重要任务，在地方上物色、培养、发展党员。政工队到那里，就在那里发展党员，建立组

织。一队的李焕先后发展 14 名党员。他因病在一贫雇农家养病时,多方接触贫苦农民,经培养教育就发展了 6 名党员,不但建立支部,还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二队在吴兴水乡,大部分乡镇都派去党员,发展了不少党员,省第二大队的陈平之、王月芳俩人发展了 11 名党员。政工队是宣传队,也是播种队,他们到那里就在那里播下红色的种子。1939 年 4 月,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向东南局汇报工作时说:“要继续依靠省政工队的党组织开展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地方组织。”1981 年 9 月在浙江新四军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黄源同志说:“浙江的地下党员,大部分是政工队发展的”,这是符合实际的。省政府于 1938 年 12 月在天目山建立浙西行署,一个月后,即 1939 年的 1 月,我们的党就以行署服务员名义派贝文、陈浩天、于以定等同志在行署里成立党支部,贝文还在浙西临时中学发展学生党员。国民党顽固派说,浙西的共产党在“三山一湖”(指天目山、莫干山、煤山、太湖),这倒也是确切的。

(五)周恩来同志关心政工队

1939 年 3 月,春寒料峭,山峦经过霜雪洗涤后,格外清新葱郁。青松翠柏前俯后仰,似乎在频频点头弯腰,迎接风尘仆仆的周恩来同志来到海拔 1500 公尺的浙西天目山。周恩来在与省主席黄绍竑会晤并视察浙江抗战工作的同时,指导了浙江党的活动。24 日,周恩来同志参加浙西临时中学的开学典礼并作了重要报告。大会在著名古刹“禅源寺”召开,参加大会的除中学师生和行署官员外,还有在浙西干训团受训、即将开赴前线的省政工队队员,共 1000 多人。周恩来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和任务,对浙江的抗战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他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例,鼓舞大家对抗战要有必胜信心。他对政工队特别关心,教导政工队要到敌后前线,负起政治进攻的任务;要反伪化,反奴化,要向敌后群众宣传抗战,清除被奴化教育的消极麻痹思想,用政治文化向敌区进攻。还要做汉奸的工作,动摇

他们,争取把他们拉过来。周恩来同志还接见了省政工二队队长姚旦同志,向他指示政工队的工作任务。在山上逗留时,周恩来还忙里抽空去看望政工队员的住处,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后来政工队员遵照周公的教导做了不少工作。一队派人到湖州敌伪据点去做伪军的策反工作。在鸿桥伪军哨所,派进一位队员担任文书,把那里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政工队队部,并里应外合缴了伪军哨所的枪械。1940年夏,一队的冯安琪和李子英为开办煤山工人诊疗所,到敌占区湖州去买药品、器械,住在冯工作过的医院的空病房里,向医院的医生护士讲抗战故事,教唱抗战歌曲,她们还把队里出版的抗战宣传半月刊《进攻》带进湖州,向熟悉的人分发,要他们自己阅后,再传给亲朋好友去看。通过两天的相聚,医院的许多人了解了外面的抗战大好形势,消除了“恐日”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六)和顽固派的较量

省政工队下属三个队,利用政工队这合法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队的活动计划的提出,基本是按照党组织的意图去贯彻执行的。通过政工队,团结了国民政府和军队里的许多进步人士,在基本群众里面,组织了各种在党领导或影响下的抗日救亡团体。政工队到那里,党的影响就到那里。经过一年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浙西城镇、山区、平原的广大群众,甚至太湖渔民都发动起来了。

不久,日寇的侵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用迫降、诱降对付蒋介石。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就腾出手来,更加积极反共。浙西行署下令,要全省政工队员和县队干部,于1939年11月到天目山干训团集中训练。所谓集中训练,就是以“防共”、“溶共”、“限共”为目的的大阴谋。对此各队党组织作了研究,让各队领导和搞文化、宣传、做群众工作的队员去,未公开暴露的党员留下。中共浙西特委在去参加集训的党员干部中,组成临时党团,加强领导。政工队

员集训的全称叫“浙江省第三期战时政治干部训练团”，团长挂省长黄绍竑的名，实际是行署主任贺扬灵负责。除政工人员外，还有贺从绍兴带到浙西的青年、妇女、少年三个营共400多人。他们把省政工队三个队打乱编排受训，限制互相接触。贺亲自上课，有次出了个讨论题“苏联出兵波兰是否侵略？”小组讨论时，党员大谈自己的观点，而大会发言时，则尽量让群众队员上去发言。这样贺想要摸底的意图落空了。贺上的另一堂课讲“党派关系”，骗小孩般地说：“加强国共合作，共产党员要亮相，政工队里不能有暗藏的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合作。不站出来，说明没有参加党派，那就请填写表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经浙西特委研究，认为我们还是要利用政工队这块公开的牌子，不参加等于暴露是共产党员，指示可以参加国民党。这样，有一部分同志参加了事。事后向东南局汇报，也认为只能这么办。集训后，把原三个大队编为五个大队。原第一大队的一队和三队合并；二队改为第二大队；原第二大队分为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原第三大队改为第五大队。撤掉一队丁箴孙队长职，派莫仲乔当新一队队长。这气炸了一、二队的全体队员：乔是叛徒，怎能领导一心抗日的热血青年？于是爆发了一场“队长之争”的斗争：莫仲乔到任后，许多同志以一年多没回家为由，向他请假探亲，莫明知这是对他不满的借口，于是大发雷霆，态度粗暴，破口骂人，队员集体向行署控告，党组织发动全体队员在行署门口彻夜静坐，最后迫使贺扬灵宣布仍由丁箴孙当新一队队长。顽固派用尽心计，都没有得逞。与行署顽固派开展的合法斗争，反而锻炼了队员。

1940年2月，第一、二大队仍回原地。顽固派见明的压不倒，就搞阴谋，派特务来探测队里共产党的活动。一个姓周的女特务，随一队到长兴，她也实在拙劣，她偷看队员日记，记黑名单，在大家面前故作姿态地翻看一张过时的新四军出版的《抗敌报》（事实上队员都能及时看到）。种种异常言行，早被同志们识破，大家让她

充分表现,直到5月开队员大会时,揭发她的特务活动,迫使她交出黑名单,把她送交县政府处理。后来说据她是第三战区派来的。不久,大队部介绍几个青年来参加一队,其中也有来自反共武装“忠义救国军”的女特务,但队员已练就一双火眼金睛,能识别是人还是妖。反动军政联手来对付积极抗日的爱国青年的阴谋,再次未能得逞。

(七)不怕艰苦与牺牲

参加政工队,就是准备吃苦受累,准备流血牺牲。编队出发时,规定政工队员每月领12—16元生活费,除了伙食所剩无几。吃的是糙米饭和咸菜,有时加几片豆腐已是营养菜了,几个月才能吃到一块扎肉,亦称是“打牙祭”。每人发单、棉各一套灰布制服,佩带符号,队员是蓝色“准尉”级。一队活动在浙西山区,翻山越岭都赤脚穿布条草鞋,很容易被山上竹尖树根刺破脚,鲜血直流也只能接着赶路,日行百里是常事儿,练成了一双铁脚板。过湖越溪,三、五女同志拉着手淌过。很少有休息时间,白天走家串户,或在团队里和群众一起活动,教歌教课。晚上有开不完的会:工作交流会、政治学习会、形势讨论会、生活检讨会等等,学习资料很少,只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而已。一本《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小说,看得皮破页跌。有时大家凑钱或拿点公积金来买书不过也只有在晚上昏暗的油灯下看点。没有时间洗衣服,替换衣服也不多,更谈不上洗澡。天热时男女都到溪边各占一段溪水揩抹一下了事。不少人都长疥疮和生虱子,戏称“革命虫”和“革命疮”,苦中作乐,也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吧!在这样艰苦的熔炉里锻炼,思想境界日益提高,大家以自私自利为耻,团结互助为荣,共产主义风格是追求的目标。人民群众最富智慧,最有朴实感情,他们给政工队编个顺口溜:“青年政工队,不怕吃苦头,吃饭捧钵头,走路拿棒头(防狗、蛇虫咬),打仗画墙头(每到一处墙上刷标语、画漫画),开会嚼舌头(群众看到日夜开会,你讲我讲,有时争